



巨大的木马和美丽的海伦真的存在吗？

金苹果引发的战争，难道只是盲眼诗人之歌？

“用你的双眼，去观察遥远的特洛伊”。

# 追寻特洛伊

[英] 迈克尔·伍德 著 沈毅 译

# In Search of The Trojan War



## 追寻特洛伊

[英] 迈克尔·伍德 著 沈毅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特洛伊 / (英) 伍德著; 沈毅译.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2

(启真人文·历史)

书名原文: In search of the Trojan war

ISBN 978-7-308-14072-0

I. ①追… II. ①伍… ②沈… III. ①特洛伊战争—  
通俗读物 IV. ①K1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5241 号

### 追寻特洛伊

[英] 迈克尔·伍德 著 沈毅 译

---

责任编辑 叶敏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94千

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072-0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相去的时光无论多么地遥远  
可能已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  
增进我们知识和精神的存在  
才是流逝岁月所带来的意义。

——艾伦斯特·库尔提乌斯 (Ernst Curtius) 在纪念海因里希·施里曼大会上的演讲，柏林，1891年3月1日。

## 前言

9

自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 (Heinrich Schliemann)<sup>[1]</sup> 首先对传说中的希沙立克 (Hisarlik) 土丘 (地处土耳其西北部) 进行发掘以来的 135 年里, 这一最伟大的考古学奥秘一直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就在不久之前, “海伦的珠宝” 戏剧性地重现——其中许多被认为于柏林 1945 年的战火中失散——又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些曾贮藏于柏林动物园中一座巨大混凝土防空高射炮塔 (the Flakturm)<sup>[2]</sup> 内的财宝 (其中包括施里曼所认定的与特洛伊的海伦本人有关的珍宝) 是由苏联军队秘密获取的: 其中的黄金归于莫斯科, 青铜器藏于圣彼得堡。如今, 这些珍宝终已重见天日, 但仍有一部分沉睡于特洛伊平原的泥土之下。随着俄罗斯以及希腊、土耳其等地——藏品的陆续展示, 关于特洛伊的传说必将不断激起人们的想象力。

与此同时, 特洛伊自身正在发生的景象, 或许更为激动人心。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停顿之后, 考古学界又对遗址进行重新的发掘, 并

---

[1] 海因里希·施里曼 (Heinrich Schliemann, 1822 年 1 月 6 日至 1890 年 12 月 26 日), 为德国传奇考古学家。出于一个童年的梦想, 他放弃了商业生涯, 执著地投身于考古事业, 使得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现天日。此外, 他还是个语言天才, 据说会十多种语言。(本书注释全部为译者所加)

[2]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入, 盟军的战略轰炸机群对德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故希特勒下令在柏林、汉堡、维也纳等多地建造了具有防空功能的要塞炮塔, 其中柏林动物园中的第一座高射炮塔最为有名。为了躲避空袭, 柏林 14 座博物馆里的重要藏品都被保存到高射炮塔中, 其中包括特洛伊战争时期的财宝、公元前 14 世纪的埃及王妃胸像、德皇威廉二世收藏的世界各国硬币等。

已提供了新的证据，其足以证明：我们所称的特洛伊——希沙立克土丘——确是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中所描述的、普里阿摩斯(Priam)和赫克托耳(Hector)<sup>[1]</sup>的传奇城邦之遗址。

10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我们分别讲述了施里曼、威廉·德普菲尔德(Wilhelm Dörpfeld)和卡尔·布雷根(Carl Blegen)三位考古学家及其发掘特洛伊遗址的故事。以上的每位考古学家都曾声称已为特洛伊战争之谜找到了答案，而实际上他们各自所发现的，只是遗址中不同层面上的不同战争。他们三人都未被公认为是已解答了特洛伊之谜的。1938年夏，最后一批发掘者——布雷根领导下的辛辛那提考古队——所挖掘的地沟已临近于希沙立克，但正如他们所承认的，他们还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施里曼的早期发掘对遗址所造成的破坏，另一部分原因是受制于当时的考古手段。恰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布雷根最后也不得不认为，遗址至此已经备受毁灭，若要从中获取更多的新证据实属难事。于是，布雷根的报告似乎一度成了特洛伊考古的最终结论。然而，又一场重大的发掘行动于1988年重新启动，考古人员对特洛伊城堡遗址及其下城进行了二十年的发掘；根据许多人的推测，下城区域在青铜器时代所形成的大型定居点很可能成为罗马帝国后期城市的基础。美国以及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为这次发掘行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以由曼弗雷德·考夫曼(Manfred Korfmann)领军的德国图宾根大学(Tübingen University)为核心所组成的国际考古团队，采用一整套现代技术手段对遗址进行了勘测与发掘，并构建了特洛伊地区的文化和环境历史。因此，我们

---

[1] 赫克托耳(Hector)，为普里阿摩斯(Priamus)的儿子，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Paris)的哥哥。他是特洛伊第一勇士，被称为“特洛伊的城墙”。最后，在与阿喀琉斯(Achilles)决斗中，死在对方手里。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原先有关特洛伊的一些未解的问题终得解决，而我们在此所概括的一些结论也将是新的最后篇章。

那么，有关特洛伊以及特洛伊战争的史实性从何而言呢？概言之，我们将沿用本书最初版本中的相关论点：希沙立克土丘，即是古希腊诗人荷马所描述的、曾被“英雄时代”（Heroic Age）的希腊人围攻过的历史城邦遗址。青铜器时代的希沙立克，很可能是安纳托利亚（Anatolia）西部——与希腊隔海（爱琴海）相望的土耳其——的一个重要城邦国家的中心。从土耳其的青铜器时代遗址中所发现的大量书写在泥版上的外交公文，业已证实这种迹象。特洛伊可能是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当时近东的主要势力之一——的一个附属国。公元前13世纪中期，特洛伊即是希腊人与赫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之起因。而且我认为，卡尔·布雷根有关特洛伊战争所发生时间的认定也有不妥之处，特洛伊毁灭的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13世纪早期（可能在公元前1275—前1260年间）。因为当时的迈锡尼（Mycenae）希腊人世界正处于巅峰时期，而赫梯人也极力企图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维持其一种松散的君主霸权地位。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历史上特洛伊战争所发生的真实背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赫梯帝国的外交文档——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些外交文档显示了赫梯帝国与爱琴海世界一个强悍的“伟大国王”之间的关系。这个国王即是希腊本土的霸主，也就是传说中的阿伽门农（Agamemnon）。简言之，荷马故事中的基本描述——有关位于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sup>[1]</sup>之畔的城邦、希腊人的远征以及所发生的战争等——是完全真实的。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我仍可以说，本书

---

[1] 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位于土耳其西北部，处在巴尔干半岛东南端与小亚细亚半岛西北端之间，为沟通地中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水道，欧、亚两洲分界线之一段。

初版中的一些推断尚未被新的发现所推翻；而事实上，即便是随着新发现的日渐增多，这些推论也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当时，荷马史诗与公元前 13 世纪的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关联性，这样的观点为许多学者所难以接受；而广为流行的看法则是特洛伊战争简直就是一个神话，不管怎么说，也与真实历史互不相干。当本书的初版面世时，还曾有幸得到对特洛伊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的前辈、已故的摩西·芬利（Moses Finley）爵士的大力批评。而在另一方面，唐纳德·伊斯顿（Donald Easton）先生也曾在《古代》（*Antiquity*）期刊上就书中的论点展开过探讨，并得出了有利于书中论点的结论。自此以后，考古学、外交文档、语言学等方面的新发现，也进一步地证明了特洛伊战争的真实历史背景，因为这些新发现已为我们提供了众多有关达达尼尔海峡之畔的城邦——此地仍是整个安纳托利亚西部最为引人关注的史前遗址——的重要而翔实的依据。由施里曼所肇始的对于希沙立克的发掘活动，距今已经历时 135 年，有关特洛伊传说的历史基础仿佛也逐渐了然于人们的眼前。

在新版的《追寻特洛伊》中，我增加了最后的一个章节，用以概述在特洛伊以及周边地带，尤其是对希沙立克遗址不间断的重新发掘的最新发现。我还在书的末尾处增添了新的参考文献目录。我十分感谢伊丽莎白·弗兰卡（Elizabeth French）博士对我所提出的询问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并允许我发表卡尔·布雷根写给她父亲艾伦·沃斯（Alan Wace）的书信——引用在第 119—120 页。我还要感谢曼弗雷德·考夫曼教授，他在比斯克山丘（Besik Tepe）和特洛伊遗址的新发现为本书带来了一些新的细节资料，得以修正原书中的一些内容。



## 致谢

12

令人尊敬的雅各布·布莱恩特 (Jacob Bryant) 说：“要是早知道探寻特洛伊会是如此一无所获的话，我宁愿去寻找乌托邦或鲁宾逊·克鲁索的加勒比岛及其小屋。” (1799年) 在他看来，特洛伊根本不存在。要说我在寻找自己内心深处的“奥德赛”的过程中有何收获的话，那么，它基本上应归功于许多学者和友人的真知灼见为我所带来的裨益。

首先，我应该感谢电影界的朋友们，他们为了拍摄关于特洛伊的系列纪录片，需要我写出此书作为其影片脚本：比尔·朗斯 (Bill Lyons) 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特洛伊人的毅力制作与导演了该纪录片；安妮特·斯汀希尔 (Annette Steinhilber) 始终是整个拍摄过程中的中坚力量；理查德·加尼克莱夫特 (Richard Gannicliff)、丹尼斯·卡特莱特 (Dennis Cartwright) 和艾伦·帕克 (Alan Parker) 总是给大家带来可靠的支持和愉快的心情；科林·亚当斯 (Colin Adams) 作为影片的执行制片人，在此系列纪录片的制作与剪辑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还要感谢戴维·杰克逊 (David Jackson)、格雷汉姆·维伟斯 (Graham Veevers)、特瑞·巴特利特 (Terry Bartlett)、帕特·哈格蒂 (Pat Haggerty) 和罗伊·牛顿 (Roy Newton)，他们出色的剪辑技术为影片添彩不少。影片在土耳其的拍摄过程中，摩尔多 (Mordo) 和沙文·博克 (Sevim Berker) 总是那

么地任劳任怨与殷勤好客。在希腊拍摄的时候，我还要特别感激玛利亚·可马里诺-鲍威尔 (Maria Koumarianou-Powell)。希拉·艾博勒曼 (Sheila Ableman) 对我的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勘校，薇芙·波莱尔勒 (Viv Brenrley) 将我潦草的手稿加以精确的梳理，对她们深表谢意。

我所要感谢的、从事于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很多，如乔治·赫胥黎 (George Huxley) 教授、凯文·奥诺兰 (Kevin O'Nolan) 教授、约翰·戴维斯 (John Davies) 教授、伦纳德·帕尔默 (Leonard Palmer) 教授、奥利弗·格尼 (Oliver Gurney) 教授、彼得·沃伦 (Peter Warren) 教授、科林·伦弗鲁 (Colin Renfrew) 教授、詹姆斯·霍克 (James Hooker) 教授和摩西·芬利爵士，奥利弗·狄更斯 (Oliver Dickens) 博士、克里斯·米 (Chris Mee) 博士、默文·波帕姆 (Mervyn Popham) 博士、南希·桑德斯 (Nancy Sandars) 博士、戴维·霍金斯 (David Hawkins) 博士、约翰·拉森比 (John Lazenby) 博士、吉姆·麦奎因 (Jim McQueen) 博士、约翰·克伦 (John Killen) 博士、利维亚·摩根 (Livia Morgan) 博士、布莱恩·海恩斯沃斯 (Brian Hainsworth) 博士、詹姆斯·杰克逊 (James Jackson) 博士、威廉·泰勒 (William Tylour) 勋爵和约翰·哈克特 (John Hackett) 爵士等，他们所有人都曾不吝时间，诚恳地与我探讨有关的观点和见解。我尤其要感谢杰弗里·柯克 (Geoffrey Kirk) 教授、R. H. 克罗斯兰德 (R. H. Crossland) 教授和约翰·查德威克 (John Chadwick) 博士所给予我的帮助和建议，以及约翰·宾特里夫 (John Bintliff) 博士、詹姆斯·梅拉特 (James Mellart) 博士、唐纳德·特雷尔 (Donald Trail) 博士和汉斯·格特博克 (Hans Guterbock) 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们所未发表的材料。感谢热心的莱斯利·菲顿 (Lesley Fitton)，为我在大英博物馆中查阅卡尔弗特 (Calvert) 和施里曼的信

件所提供的便利。感谢肯恩·柯钦 (Ken kitchen) 博士, 为我所提供的许多难得的资料以及热情的鼓励。感谢唐纳德·伊斯顿, 毫无保留地与我讨论特洛伊问题——基于他对施里曼的笔记所做的研究成果, 并允许我采用他所正要发表的资料: 所有的爱好者都在急切地期盼着他的著述的问世。感谢詹姆斯·凯迪 (James Candy), 让我分享他关于亚瑟·埃文斯 (Arthur Evans) 爵士的回忆录。感谢桑迪·麦克格雷富瑞 (Sandy McGilivry)、辛克莱·霍德 (Sinclair Hood) 和威廉姆·泰勒 (William Taylor), 让我在克诺索斯 (Knossos) 这处神奇遗址的一家“小酒馆”里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我们在那里探讨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感谢凯瑟琳·可玛丽安诺 (Catherine Koumarianou) 教授、C. 杜马斯 (C. Doumas) 教授、斯皮罗·杰克乌德斯 (Spiro Jacovides) 教授、J. 萨克雷瑞克斯 (J. Sakellerakis) 博士和亚历山德拉·卡雷索 (Alexandra Karetsou) 博士, 在希腊所给予我的极大帮助。感谢乔治·米洛纳斯 (George Mylonas) 教授, 让我在迈锡尼所度过的难以忘怀的一天。十分感谢雅典和伊斯坦布尔的德语学校所给予我的热心帮助, 对梯林斯的克劳斯·克里恩 (Klaus Kilian) 尤表谢意, 因为他为我付出了大量时间并提供了资料。在雅典, 杰罗姆·斯普林 (Jerome Sperling) 与我分享了他对辛辛那提考古队发掘经过的令人兴奋的回忆, 在此表示感谢。在土耳其, 艾克林·阿库尔加 (Ekrem Akurgal) 教授、T. 奥斯库克 (T. Osgüç) 教授、塞达特·艾普 (Sedat Alp) 博士、特洛伊遗址的负责人穆斯塔法·贡茨·舍维奇 (Mustafa Gözen Sevinç) 和土耳其历史学会为我提供了帮助; 卡尔斯 (Kars) 公共场所的吟游诗人们为我演示了故事歌手的古老传统, 在此深表谢意。在欧洲的西部, 通过谢默斯·奥·凯森 (Seamus O Cathoin) 的引介, 约翰·亨利 (John Henry) 和爱尔兰西北部梅奥郡 (Mayo) 的

14 克尔加利根人 (Kilgalligan), 让我领略了不列颠群岛这一仅存的传统, 在此一并感谢。最后, 我要感谢约翰·鲁斯 (John Luce) 教授, 赐读了我的文稿并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感谢伊丽莎白·弗兰卡 (Elizabeth French) 博士, 她苦于作为我的近邻, 对我不时的寻访表现出了极大的耐性: 用她的玩笑话来说, 我无论怎么感激她都不为过。然而, 我在此尤为需要申明的是: 对以上的专家学者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对本书中所可能出现的谬误之处承担任何的责任。针对这样一个颇具异议的领域, 作为一部综合性的著述, 本书不大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相关的理论见解, 正如妙语所言: 历史学家靠歧义性而生, 新闻记者靠确定性而活! 至少, 我希望一个世纪之前的格莱斯顿 (Gladstone) 在研究荷马时所说的话, 至今对我们依然是情真意切的: “对于伟大的世界经典及其真实结果的探究, 我们已经不遗余力了。与其以千言万语去描述流水或泥沙, 不如用只言片语来书写岩石。” (《荷马研究》)

在漫长的岁月里，伊利昂（Ilium）<sup>[1]</sup>之于外部世界，就如现在的耶路撒冷之于基督徒，因饱受战争和苦难的传闻以及所笼罩着的远古庄严气氛，使其成为一个吸引朝圣者的“神圣”之城。假如不算是在滥用语言的话，我们不妨说，从这个小山岗发出的呻吟，倾诉着三千年之前的整个古老世界的故事，回响缭绕至今。

——查尔斯·玛格罗兰（Charles Maclaren），《特洛伊平原的叙述》（1863年）

跨越“水流湍急的赫勒斯庞特海峡（Hellespont）”<sup>[2]</sup>的汽车渡轮，自加里波利半岛（Gallipoli）<sup>[3]</sup>出发，走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前往对岸的恰纳卡莱小城（Çanakkale）。达达尼尔海峡浪涛汹涌翻滚，波浪如绿宝石般熠熠闪光，拍岸的波峰在疾风中喷溅起诱人的水沫。峡口宽不过1英里，波斯王薛西斯一世（Xerxes）曾在此架过浮桥，英国浪漫诗人拜伦曾在此游泳横渡。加里波利半岛以及一场历历在目的惨烈战争的记忆，在我们的身后渐渐远去；抬头前望，进入眼帘的已是亚洲的海岸和恰纳卡莱的清真寺尖塔。自史前以来，此处一直都

---

[1] 伊利昂（Ilium），为古代特洛伊城的拉丁名文。

[2] 赫勒斯庞特海峡（Hellespont），为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希腊名。

[3] 加里波利（Gallipoli），为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西侧的半岛，以宽5公里的布莱尔地峡与大陆相接。

是军队、商人或移民两岸穿越的航道，也就是通往特洛伊之路。

特洛伊之路！对于世上芸芸众生来说，像特洛伊这样令人情满胸臆的地名能有几何？在人类所讲述的和有史所记载的全部故事中，还有哪里比它更闻名遐迩？

16 穿过恰纳卡莱小城那些由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沿着海岸，有一条向南伸展的现代柏油路，引领我们经过古老的达耳达诺斯（Dardanos）遗址——现在只是一座散落着些许历史残迹的不起眼的山坡。沿路的右边，松树垂岸，左边是一些低矮的山坡。远处可见或上行至黑海或下行入地中海的船只——一艘希腊货船和一艘俄罗斯巡洋舰正在悠然游走；一群群捕捞马鲛鱼和金枪鱼的小型渔船一如青铜器时代的捕鱼方式那样正在海面上繁忙作业。车子大约行驶了10来英里的路程之后，经由埃伦考小城（Erenköy）进入一片四处可见棉花、向日葵、大鳞栎、小麦的肥沃平原；在河岸、堤边，生长着成行的白杨和柳树，牛群在其间自得觅草。人们甚至可以看到在此经过的、驮负着烟草等商品的骆驼队——还是远古的方式，在编织华丽的鞍褥上，用绳索捆绑着储物罐来装运货物。这里是杜姆瑞克苏河（Dumrek Su）——古老的西摩伊斯河（Simois）的河谷地带。向眼前的右角望去，是一条树木繁茂的长长山脊，离平原地面约有百来英尺高。上山的路径较为陡峭，山顶上立有一个路标指向右方：“特洛瓦”（Truva）——特洛伊。

转入一条狭窄的乡间小道，沿着山脊向西行走，就会看见大海。再向左走，路过一个岔路口之后，就到了一个名为赛普莱克（Çiplak）的村庄：村中的小路错杂、泥泞，安纳托利亚式的木质悬臂房子外观灰泥斑驳、编条破落；路边的鹅群嘎嘎乱叫；一个小男孩正用细长的藤条将自家的牛赶入围栏。这里曾是海因里希·施里曼于1870年着手

发掘遗址时所最早居住的地方。这里也曾是“凶猛的”土耳其人生活的一个村庄，可能是15世纪或16世纪所创建的一个定居点，当时新伊利昂（New Ilium）邻近的地方已经人迹稀少。据旅行家们于1816年的记述，这个村庄是在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实，施里曼也已说过，他在1873年的发掘中发现了用石头建造的新清真寺和尖塔。继续驱车前行，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名为特弗费克伊（Tevfikiye）的村庄，村中有纪念品商店和伪造的“施里曼房子”；这个村庄完全是在施里曼挖掘之后的残迹上建立起来的。特弗费克伊西面的庄稼地里，散落着石块以及红白脉纹的大理石碎片。这一高地即是新伊利昂，存在于公元前700—前500年间的古代城市遗址。人们相信，这个地方就是毁于特洛伊战争的城邦遗址。狂风吹拂着遗址周边的橡树，卷起飞扬的尘土。穿过树林，我们可以看见一头昂然屹立的木马，造此木马的目的是为了让观光客们在“厉害的阿尔戈斯（Argos）<sup>[1]</sup>野兽”——“前来舔吸王子们的鲜血”的希腊英雄们从其腹中蜂拥而出——前拍照留影之用。这里刮的是什么风啊，如此寒冷而凄厉？（荷马不是说过吗？特洛伊的“风力很大”。）

17

走过遗址展览馆周围的林间空地，我们来到一个陈列着瓮瓮罐罐和雕像基座的整洁小花园，雕像基座上用漂亮的古希腊大写字母铭刻着破损的语句，仿佛给人以一种古代世界浑然一体的感觉：“墨勒阿革洛斯（Meleager）<sup>[2]</sup>向伊利昂的市议会以及人民致敬……以其对庙宇的崇敬之心和对你们城市的友好之情……”（文明的定义是“一种

---

[1] 阿尔戈斯（Argos），为希腊东南一古城。

[2] 墨勒阿革洛斯（Meleager），在希腊神话中，为卡莱敦国王俄纽斯和阿尔泰亚王后之子，阿尔戈斯诸英雄之一，斩除了卡莱敦的野猪怪。

城市的生活”，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 [Seneca]<sup>[1]</sup>曾写道：“若要我勾画一种关于人类生存的真实图景，我却会为你描绘出一幅一座伟大城市遭受洗劫的画面。”)

穿过一片树林，我们即来到了遗址的所在地——被称为希沙立克的山丘。此时，我们蓦然发现，自己仿佛站到了高原的边缘。山丘的北面和西面由极为峻峭的坡面陡然倾斜到绿意盎然的平原；所以，这座城市伫立于一个高地之上，即便不像荷马所描述的那样“高悬入云”，但至少也是在一马平川中突兀而起。站在遗址高地向西南望去，透过位于海岸边的西革翁 (Sigeum) 山脊，我们可以看见忒涅多斯岛 (Tenedos)<sup>[2]</sup>明显驼起的背影；根据荷马的描写，在围攻特洛伊的十年当中，希腊人在忒涅多斯岛建有一个大本营。如果气候晴朗、天空透明的话（这种天气并不常见），朝西北望去人们可以看到爱琴海以及远处的一座看起来像海岬的岛屿：这就是伊姆罗得岛 (Imbros)。在能见度特别好的情况下，透过伊姆罗得岛的顶端，人们还可以窥见位于 50 英里开外的萨莫色雷斯岛 (Samothrace) 上那座被称为芬格瑞 (Fengari) 的大山的壮丽景象。“色雷斯人的萨摩斯岛，其顶部树林茂密。”荷马说，海神波塞冬就是在这座芬格瑞山头注视着特洛伊战争的。1810 年，旅行家爱德华·克拉克 (Edward Clarke) 对这一壮丽场景做过如下的描述：

---

[1] 塞涅卡 (Seneca, 公元前 4—公元 65 年)，为古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他受斯多葛哲学影响，精于修辞和哲学，并曾担任过著名暴君尼禄的老师。他主张人们用内心的宁静来克服生活中的痛苦，宣传同情、仁爱。他一生共写过 9 部悲剧和 1 部讽刺剧，多半取材自希腊悲剧。其作品风格崇高严肃，夹杂大量的道德说教，使得其笔下的对话和人物都缺乏真实感。其代表作是悲剧《特洛伊妇女》。塞涅卡晚年因参加元老院贵族反对尼禄暴政而被尼禄赐死。

[2] 忒涅多斯岛 (Tenedos)，为爱琴海岛屿，属土耳其。



……神来之笔也难以描写这一奇观：萨摩斯岛以其宏伟的身姿伫立于浩瀚的大海之中，其轻盈的山峰在无云的天空中熠熠生辉；尽管距离遥远，但其雄伟气势仿佛可以压垮整个特洛伊。萨摩斯岛可能是在一场地震中突兀而起的。

今天被称为特洛伊的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假如你期待它会是一片广袤之地，并拥有“伊利昂的无极塔”、中世纪的城堡或希腊的巨石城墙等，那么，你将会大失所望。这是一块只有长约200码、宽约150码的狭小地方，也就是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院落（St Paul's Churchyard）或尤斯顿火车站广场（Euston Station concourse）那样的大小。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道精心修建的城墙，其背后则是一片杂草丛生、沟壑错乱、碎石遍地、迷宫一般的陈年废墟。

人们所注意到的第一印象会是：废墟分为好几层，看上去并不是单一的特洛伊。由于难以区分特洛伊在不同阶段的特征，而且，遗留的残迹被搅和在了一起而无法辨认，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人们在此处看不到一幅清晰的图景。如今绝大部分遗址已遭毁坏：首先，当古代建设者们在山丘的不同层面上建造新的城市中心时，就要拆毁原有城市的许多内部建筑；其次，历次的考古发掘必然又对遗址产生再度破坏。参观者们只能从那些参差不齐的石峰间，得出有关这一山丘的原始高度的大致印象。实际上，自1870年以来，发掘者们对此山体进行了多次的反复挖掘，包括：海因里希·施里曼从1870—1890年的6次重大发掘活动；威廉·德普菲尔德在1893年和1894年的2次发掘活动；美国人卡尔·布雷根从1932—1938年的发掘活动。因此，如今只留下了这些错落的石峰，以及遗址南边一小块未受触动的区域——留待后人验证前辈的研究成果。